



跑步、做饭及其他

□陶 纯

搞创作的人免不了写创作谈,有些创作谈貌似深奥,实则七拐八绕,似是而非,不知所云,令人如坠云雾。这次不谈所谓深的,往浅了说。

2010年之前,除了读书写作,我几乎没有其他爱好,不下棋不打牌不运动不吸烟,偶尔被迫喝顿酒,就跟个书呆子差不多。2010年,我从北京北五环外的清河小营搬到德胜门外的五路通街,隔壁有一座公园,叫人定湖公园,不大,很幽静,还有一片湖,一天早晨,我心血来潮沿着湖边跑了几圈,感觉很好。从此以后,就喜欢上了跑步——总算有了一个爱好。

7年来,只要不遇上极端天气,每天早晨6点多起床,必到公园里慢跑四五公里,一天不跑,就感觉少了点什么,浑身不自在。由此我想到写作——写作其实就像跑步,对于大多数作家来说,凭借的不是爆发力,而是耐力,毕竟一鸣惊人的作家是少数。当年巴金26岁写出《家》,肖洛霍夫23岁出版《静静的顿河》第一、二部,这种现象现在很难出现,因为现代人生活安定,尤其年轻人缺乏大起大落的人生阅历,当作家不像诗人和音乐家,后两者主要抒写自己的感情,不一定需要丰富的经历与深刻的观察,所以容易出“神童”,作家不同,如今作家通常都需要具有丰富的阅历与长时间思考之后,才有可能拿出惊人之作。所以,写作是一场长跑,惟有坚持、坚持、再坚持,或许才能成长、成长、再成长。就像我上面说的跑步,跑到人生终点,写到人生终点,沿途一定会有一些风景,让你刮目相看,或者让读者对你刮目相看。王蒙先生80多岁了,还能写出质量上乘的中短篇小说,便是很好的榜样。

再说做饭。除了跑步之外,如果再说一个爱好,那就是我清闲时喜欢下厨,虽说厨艺谈不上精,但也马马虎虎说得过去。做饭,好吃是硬道理。由此我想到,写出的作品,好读耐读是硬道理。不好读的小说,很难说是好小说,正像饭菜,不好吃的,能叫好饭吗?好吃是第一步,是基本,不但好吃而且还有丰富的营养,还是健康食品,那就更棒了。作品应如是——那些提炼出真善美的、引人无限遐思的作品,一定是好作品;那些难以卒读的小说,就像是难以下咽的饭菜,有人嘴上说喜欢,那是糊弄你,我不相信他真的喜欢。

作品要想好读,作家得学会讲故事,得想办法讲出新鲜的故事,一部长篇,头两页就得把读者的胃口吊起来,否则现代人那么忙,就没有耐心往下看。我年轻的时候,一度迷恋所谓的先锋文学,对西方的现代派、南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五迷三道,后来才发现,走了弯路。中国人吃惯了馒头稀饭包子油条,吃西餐总是感到不对胃口,消化起来也有问题。

因此,我更倾向于认为,当作家,首先得学会讲自己的故事,迷恋别人的收割机,不如打磨好自家的镰刀。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学传统,中国土地上最好的文学风景,可能不是什么魔幻,而是中国式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才是中国文学的根。拥抱生活,反映现实,是拉近和读者距离、挽救文学的最好办法。真正的力作,应该是反映社会深刻矛盾的。那些碎片化、私人化的写作,小情小调,鸡毛蒜皮,玩点文字游戏,很容易千人一面,同质化严重,不是正途;而那些抒写家国情怀、感时忧国、接续传统的作品,才更能体现文学的力量。



陶纯,鲁迅文学院首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现为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系统专业作家。有大量长中短篇小说见于各文学期刊,部分作品被各类选刊转载。长篇小说《一座营盘》入选2015年度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当代》长篇小说“年度五佳”。曾两次获得“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大奖”,两次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三次获得“全军文艺新作品奖”一等奖,两次获得“中国图书奖”,以及《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中国作家》等刊物优秀作品奖。

在军事文学领域不断开掘——陶纯小说论

□张丽军 李君君

如果从1986年在《青年作家》上发表短篇小说《愿望》算起,陶纯进入文坛已逾30年。纵观陶纯30余年的创作,抛除其中10年左右时间他进行影视剧本创作外,20年里,他发表了300多万字的小说,大部分是军事题材的作品。众所周知,军事题材包含两大块——战争与和平时期的军营生活。说句实在话,这两个领域是两块硬骨头,都不好啃。

革命历史题材向来是军旅文学书写的重点。16岁就来到军队的陶纯决心以手中这支笔,写出几部好的作品来追忆过往的峥嵘岁月。回顾历史,刻画战争中的人与人性,是陶纯早期创作的重要内容。温暖的文字、细腻的情感、鲜活的人物形象、别具匠心的切入角度以及叙事中的崇高美是陶纯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给人的整体感觉。《小推车》《好天气》《天佑》《彩蝶飞舞》《生灵之美》等都是这类题材中的重要作品。

短篇小说《小推车》是一部优秀之作。小说以淮海战役为背景,叙述了农村青年柱子受到战争热烈氛围的感染,跟随队伍走向战场后,他的父亲王怀炳老汉和邻居——新寡的少妇小娥也毅然加入支前队伍,用小推车运送军用物资来与他们共同爱着的人一起奋战的故事。小说中的三个主要人物柱子、怀炳老汉、小娥原本都不需要上战场,但革命年代里为了战争的胜利,老百姓真诚奉献的心是火热的。陶纯用饱蘸生命情感的文字,渲染出了革命老区的热烈气氛:“号声在村落、田野和山间久久回荡。不见首尾的队伍在村外的官道上蜿蜒西去。老人、妇女和孩子们驻足于道路两旁,锣鼓声震天作响,妇救会的大闺女小媳妇把秧歌扭得像刚出锅的麻花,香喷喷让人眼花缭乱;煎饼、鸡蛋、苹果、花生、核桃、大枣在人群里飞来飞去,仿佛是天上落下来的。”一段极具画面感的文字,就将读者带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柱子的同班战友小算子临终前善意的谎言成了怀炳老汉和小娥战乱年代里的盼头,他们这一老一少成了战场上最英勇的支前队员,即便是后来得知柱子早在参军后的第一场战斗中就牺牲了,他们悲恸过后,依然坚强地推着小推车继续前进。这份朴素却又沉甸甸的情谊正是人民战争得以胜利的基础。小说的动人之处还源于陶纯充满生命温度与情感积淀的文字,早年乡村劳作的经历使陶纯形成了独特的语言系统。独生子柱子在59岁的怀炳老汉心中是什么位置呢?“柱子虽然长成了壮小伙子,但在怀炳老汉的眼里,他的儿子永远是庄稼棵上的嫩须须,开春时的树芽芽,碰不得拽不得,不容有闪失的。”庄稼棵上的嫩须须,开春时的树芽芽,那可是惜地如命的庄稼人的心尖尖呀。没有乡村经验是很难写出这样细腻、准确又接地气的文字的。陶纯的小说语言别有一种来自土地的气息之美。

中篇小说《天佑》(《人民文学》2016年第7期)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推出的作品。为了给部队搞给养,战士王大妮和唐本奇勇

装打扮成货郎夫妇,诱绑了彭家寨大地主彭贵山年仅6岁的小儿子天佑,阴差阳错间王大妮等人无法将“人质”天佑送回家,不得不带着天佑跟随队伍一块儿前行。一路上本有多个机会将天佑留下来送人,但活泼可爱的天佑在与众人的相处中已经产生了感情,在几番纠结和斗争中,战士们决定带着他继续前行。在最艰难的长征路上,战士们依然关心、呵护着天佑。在玉龙雪山,唐本奇拼死将天佑托出了雪窟窿,自己却再也没能出来;在藏族聚居区巴安,部队因给养严重匮乏欲将天佑托付给寺庙住持时,极度愧疚与不舍的毛小虎为给天佑留下一只大灰兔作伴,而永远地留在了巴安城东的沼泽地里;在遭遇藏民武装袭击时,王大妮为保护天佑被打得全身流血而亡;在弹尽粮绝的松潘草地上,连长徐发祥紧护着腰间留给天佑的最后几把米而自己却再也没能醒过来……这些本身还是大孩子的战士们在长征路上为救天佑相继牺牲,而毛小虎用生命换来的那只大灰兔在长征的最后时刻救了20个人的性命。《天佑》将人间正道融于对一个孩童的生命呵护,以最纯真、纯粹的人性之美诠释英雄情怀。

中篇小说《秋莲》(《解放军文艺》2016年第10期)塑造了一个另类的“女特务”形象。秋莲的父亲、国民党高级将领许宗衡在淮海战役中阵亡,母亲也随后病逝,在上海,举目无亲的秋莲在初恋对象高伦的诱惑之下加入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一次偶然的机会,秋莲救了解放军某部英雄团长马九龙的性命,在线上老K的指示下她嫁给了马九龙。秋莲在做“母亲”和“妻子”的过程中渐渐忘了自己的特务身份,并爱上了自己的丈夫。然而,“特务”身份始终像一团阴云将她笼罩,在高伦威逼之下,秋莲战战兢兢地送过两次假情报,她的内心承受着极度的煎熬。丈夫和同事们对她越信任,她就越感到自卑和愧疚,历史错误终究有被清算的那一天……小说结尾处,秋莲身份被发现后自杀未遂,马九龙辞去了所有职务,尽管在秋莲的政治身份上马九龙打错了“包票”,但他并不后悔这辈子娶了秋莲做老婆。人性的幽微与历史的吊诡在秋莲复杂的人生遭遇中体现出来。

严酷的斗争现实,考验着战争中的每一个人。“开小差”现象在以往的军旅题材中极少表现,短篇小说《好天气》却独辟蹊径地从这一角度入手,展现了战争中真实的人和人性以及红军战士的英雄形象。红军处于最困难的时候,战士们都已经疲惫不堪了,此时丁小栓却意外地发现队伍竟然走到了离自己家不远的地方,他不由得回想起一年前在那个宛若梦境的好天气里自己在山顶放牛的情景……大牯牛的意外坠崖使他成为了红军中的一员。可自从当了红军之后,打仗打得脑子都乱了套,自己的亲人都很少想,哪里还有心思关心天气和风景呢?远离战争,渴望和平是战争年代里每一个人的心声。小说就在紧锣密鼓的战斗中让丁小栓一次次联想到:如果是个

好天气,作为普通乡村老百姓的他又该在做什么呢?与想象中那个明净、欢乐的世界相比,丁小栓此时所处的战场仿佛像是另一个与之对应的黑暗时空。战友斜眼、麻将、班长、老黑、书生的相继牺牲让小栓的心再也不动摇了,他放弃开小差,最后一次用眼神抚慰了自己的家乡,在将战友们遗体摆放好之后,打完了最后一颗子弹,弥留之际的他仿佛又见到了梦境般的好天气。《好天气》从人性的柔软处入手,歌颂了红军战士的英雄形象,谴责了战争对美好人性的戕害,短短的篇幅竟给人以荡气回肠之感。短篇《彩蝶飞舞》和《生灵之美》也都从不同角度表现了战争对美好的人和事物的毁灭。陶纯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往往能选取特殊的切入角度,以鲜明的人物形象、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朴实又不失灵动的文字串联起一个个带有时代感和崇高美的富有历史温度的故事。

真实的人性不仅包括人的创造性、能动性,还应包括人的局限性。陶纯写得更好的是反映和平时期军人生活的作品。陶纯从中国当下军营生活和军人的现实境遇出发,打破了笼罩在军人身上的层层光环,正视时代和文化转型时期军旅生活的新变化。在反映当下的军事题材创作中,陶纯从军队、机关、家庭等多个角度切入,将以往军事文学中被遮蔽或者说被淡化的军人的情感、欲望、苦闷、挫败还原,展现出当代现实生活中基层官兵的精神生活与现实遭遇,映射出军人的理想、意志和品格在当下社会现实面前受到冲击的现实。

短篇《一个人的高原》呈现了长年驻守西部高原的老兵的精神苦闷。长期面对高原造成了老兵与正常社会的某种脱节和“失语”,家乡的人早已不认识他,而在回乡时与姑娘的短暂接触中,他语无伦次的高原语言让姑娘望而却步。故乡也将他抛弃了,退役之后他将何去何从?没人能给他一个答案。《一个人的高原》表现出长年驻守边疆的士兵精神的“无根”与现实的苦闷,令人震惊和悲怆。

与冲锋陷阵相比,日复一日的机关生活可能更是对军人意志和品格的考验。中篇小说《雨中玫瑰》中的李明扬作为国防科技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在学生时代一直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参加工作后,即便是写机关公文这样“干巴巴的材料”,李明扬也能像写文学作品那样,笔端注满情感。当以往的同学、朋友成为商界的成功人士后,妻子赵梅也对他的工作产生了不满,认为他的工作没有多少实际价值,作为曾经的“战友”,如今的商业人士、妻子赵梅早已取得了成功,而李明扬却拿着和小区保安一样的工资。夫妻二人的交流越来越少,价值观也出现了极大的分歧,在发现曾经崇拜他的妻子赵梅可能已经红杏出墙后,他再也坚持不住了,他的情感渐渐消失了,写的材料越来越差,职务晋升也遭遇意外的失败。时代之变带来了价值观的冲击,任何时代都是属于强者的。陶纯表达了对和平年代里军人个体价值

■印 象

不忘初心说陶纯

□潘 灵

1992年初冬,我有生头一回进京。当时我是云南人民出版社的一名年轻编辑,正领命做一本大型纯文学双月刊的前期工作,这本刊物,就是后来在文坛享有盛名的《大家》。初到北京,人生地不熟,但我胆子不小,一个人摸索着去了《青年文学》,偶遇知名编辑李东东。李老师听说我此行的任务是找在京的青年作家,为未来刊物的稿源做准备工作,便帮我介绍了几个人,其中就有正在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的陶纯,二十多岁的陶纯已经在《人民文学》《青年文学》《上海文学》《解放军文艺》等大刊发表过小说,作品还被《新华文摘》选载过,这在当时颇为不易。

我拿着李东东写给我的纸条,先去了军艺,没费力气就见到了陶纯。人与人的关系真是奇怪,有的人与你一辈子共事,彼此都难成朋友;而有的仅一面之交,便成为永远的朋友,仿佛前世就认识——我与陶纯,便属于后者。

从第一面我就看出,陶纯有颗细腻坦诚的心,这个出身山东贫穷农家的子弟,善良敦厚,沉稳实在,很低调,不张扬,总是面带微笑,性格不愠不火。我们相识26年,每年都要多次见面,我从未见过陶纯怒火中烧的模样,他总是微笑着。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一旦想到陶纯,就会阴转晴。

《大家》创刊不久,我就责编了陶纯的短篇小说《村殇》,写的是农村被渐渐破坏的政治生态和基层干部的腐败问题。文章跟他人一样,不愠不火,不紧不慢,感性而调皮的文字会逗你一笑,但它是有深度,有力量的。送审时,主编问我为何选发这篇小说,我揶揄说,大概是因为微笑的批判现实主义。主编愕然,审完稿子后说,你是对的,只是这微笑里,夹杂了讥讽,这是篇有分量有特点的农村题材作品。

陶纯从军艺毕业后回到驻济南的部队当专业作家。我在《大家》做编辑期间,常去山东组稿,每次笑眯眯接送我的都是陶纯。如果说,那个时候我们之间的关系是编辑与作者的关系,那么后来我离开《大家》,我们就变成纯粹的朋友间的交往了。离开《大家》,使我品尝到了文坛上的世态炎凉,一些原本交往颇深的文人朋辈,因此与我渐行渐远。陶纯则不然,每次去济南,他仍然一成不变地、

热情地迎来送往。有一次,我们闲聊到鲁菜,没想到第二天,陶纯就把我们带到一家有名的鲁菜馆,特意请熟悉的厨师做了经典的鲁菜,然后笑眯眯地看着我大快朵颐,有一道菜叫九转大肠,那道菜的滋味,20年后仍然弥漫在我的记忆里。

2002年秋天,我和陶纯又多了一层关系:同学。我们共同进入鲁迅文学院首届全国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那届高研班,后来被文坛中人戏称为“黄埔一期”,49名同学都颇具实力。由于性格的原因,陶纯在这个班上是最受欢迎的同学之一。因为是老相识,彼此知根知底,所以我们二人之间的交流是最多的。我们都憧憬着,借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力争回去后多写出几篇有分量有影响的作品。但是毕业之后,陶纯却出人意料地转行进行影视剧本创作,10多年时间里没发表一篇小说。这让我深为遗憾。2006年,他调到北京后,我们见面的机会更多了。我发现,在影视创作上风生水起的他,少了一丝快乐,多了一丝忧虑。某一天酒过三巡后,他跟我谈写小说的打算,再三向我强调,写剧本和小说比,让他快乐的还是后者。我就说,尊重你的内心吧。

其实,他是否还能回到小说创作上来,我当时是存疑的。但陶纯就是陶纯,他的转身是华丽的。他归来呈现的是一份厚礼,一部沉甸甸的大书《一座营盘》。这部长篇最先在《中国作家》发表,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好评如潮。因为小说触及了军队反腐,一时成了畅销书。除长篇外,他又相继在《人民文学》《当代》等重要期刊上发表了《天佑》《秋莲》《平平的世界》等中篇小说,几乎所有的文学选刊都选载了它们。从影视创作重返小说创作的陶纯,不仅没有因为写剧本“糙”了自己的手,而且进一步拓展了创作视野,更会讲故事了。他声称自己回归,是不忘初心的表现,因为文学是他最早的人生追求,是一辈子都割舍不了的。

大约20年前,陶纯曾经微笑着对我说:我们写小说,不靠爆发力,而是靠耐力,坚持走到最后才算胜利者。这话我一直记着,现在说出来,与陶纯共勉。

与布小朋相比,孟广俊恰恰相反,他是一个机智灵活、胆大心细、善于投机钻营的人,正像有论者指出的,“很大程度上,孟广俊这个人物就是在人情社会中脱颖而出的典范”。他费尽心机在基地周围转了好几圈,只能为给下来视察的总部江副部长做出一碗满意的臊子面;他独创了“四菜一汤”换茬的接待办法,表面上遵守了规定,却又维护了领导的面子;为讨好北京的孔家瑞首长,他把孔家瑞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安排进了师职干部病房;在担任营房处处长期间,他大搞营院建设,铺张浪费严重,但短短三年之间也让基地营区大变样,旧貌换新颜;允许军队经商办企业那个时期是孟广俊的“黄金时代”,他把军车牌租出去赚钱,通过关系搞到军用飞机走私韩国现代汽车,又组织调动各方力量倒建材、倒油、倒煤、倒化肥、倒食用油,他所做的每一笔生意都赚钱。基地靠他挣的钱给干部们盖了七栋宿舍楼,一举解决了多年的欠债。这一复杂的人物形象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当代文学中,我们看到了太多关于“失败”和“妥协”的故事,那些充满了浩然正气、给人以信心和力量的“英雄”形象似乎越来越少了。毫无疑问,《一座营盘》是当前军旅文学创作的重要收获,是一部能够在军事文学创作史上留下地位的作品,它一扫“温柔敦厚”的文风,直指军内腐败问题,塑造了一个信念坚定、始终心系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平凡英雄”布小朋的形象。另外,孟广俊、夏忧等人物也是过去文学画廊里鲜见的艺术形象。作品抓住了事关我们时代和民族命运的大主题,以别样的勇气和魄力对整个中国军队的状况进行了深刻的披露和反思,写出了和平年代里人民军队面临的是一场更加严酷、可怕的战争——反腐之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输不起的战争。作者多次表示,写腐败不是为了展示腐败,而是为了呼唤正义与清明,《一座营盘》让我们看到了陶纯的忧患、勇气、血性与担当。

今天,作家们更应该承担起民族和时代的责任,继承本民族的文学传统,关注当下中国现实问题,勇立时代潮头,创作出更多生长于中国土地上的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的好作品。陶纯对于和平时期军人形象的塑造、军旅文学表现领域的开拓,都让我们看到了氤氲生成的大气象。书写现实,又不回避矛盾,以真诚、坦率的态度揭露当下现实存在的种种问题与矛盾,陶纯挖掘的深度与批判的力度在当代军旅文学中前所未见,但正因其蕴含的强大正能量,反而不让人感到灰暗与绝望。希望的花朵不惧黑暗的火焰。

本专刊与鲁迅文学院合作